

### 三 如何深化抗战大后方研究

十几年来,抗战大后方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为这些研究成果高兴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抗战大后方的研究各地开花,全面结果。有几点感想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大后方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重庆,出现了一极化现象和西部抗日战争研究状态整体失衡。尚季芳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对西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有充分的研究,而对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认识很不足,仅有的研究只关注个别省份,而无整体关照。有的文章虽以‘大后方研究’冠名,但其研究对象则局限于西南地区。”(尚季芳:《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历史教学》2020年第10期,第55页)这种研究力量和成果比较集中的现象确实存在。重庆在战时非常重要,政治、军事、外交都处于中心地位,资料留存多,十几年来重庆官、学界积极推动,学者们积极努力,出现了抗战研究繁盛局面,可喜可贺,希望西部其他省区把抗战研究放到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迎头赶上。有些地区虽然没有日军入侵,但也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样值得研究。这些地区的人民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关怀战况,并尽可能地支援前线,有些年轻人还加入军队,直接到前线杀敌。虽然这种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克服各种不利条件,为提高西部抗日战争研究整体水平做出更大努力。

第二,“西部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课题应该引起更多学人的关注。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虽然不少地处偏僻之区,但抗战精神是一样的。他们在抗战期间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人物,应该加强研究。因为所在区域不同,这场战争对各个少数民族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各个民族是如何抗战的,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和特点?需要做深入具体的研究。

第三,重视区域内外的彼此联系。大后方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三个不同而相互联系的区域,不管是敌后根据地、大后方还是沦陷区,都处在变动之中,此消彼长、犬牙交错的情况一直存在。要把这段历史放在具体的时空中加以研究,那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期待更多西部抗日战争研究成果问世。

第四,重视抗日战争前后历史的连续性。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阶段,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西部作为复兴基地,做出了伟大贡献和牺牲。同时,战时大量人员、物资进入西部,促进了西部的开放和开发,影响深远。在西部自身发展史上,抗日战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这和后来的西部三线建设和如今的西部开发都可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大力研究和发掘。在历史连续性视角的观照下,深入挖掘抗日战争时期西部的变与不变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21-05-11

作者高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 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的进展及思考

潘 洵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各地城乡的轰炸,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局部侵华战争时期对东北、上海等区域的轰炸,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协同地面军事进攻的轰炸,战略相持阶段对大后方的“战略轰炸”,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策略性轰炸。持续时间几乎与日本侵华战争相始终,轰炸范围遍布除新疆和西藏以外的所有行政区域,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潘洵、赵国壮:《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演进及其性质》,《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0年第2期)。侵华日军对抗战大后方的无差别轰炸,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相持阶段扩大侵略战争的最重要战略举措之一,是整个侵华战争时期强度最大、范围最广、损害最为惨重的轰炸,是一个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典型的人道主义暴行事件。

## 一 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后改为防空处)编印的1939年至1945年的历年《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共5册)(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防空处编印《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其中1939年至1942年各一册,1943—1945年为一册。),就侵华日军对大后方的轰炸进行了初步的检讨。战后不久,日本方面总结航空进攻作战视角时也有一些专题著述,如《战史丛书》之《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中国方面海军作战》等[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东京:朝云新闻社,1966—1980年版]。台湾地区在战后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纪要初稿》《防空抗日战史》《抗日战史》[《防空抗日战史》,台北:“空军高射炮兵司令部”编印,1953年版;《空军抗日战史纪要初稿》,台北:“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编印,1956年版;《抗日战史》(总101卷),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行,1966年版]等对此亦有涉及。

由于战后冷战格局形成和中国政局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内,侵华日军对中国的轰炸几乎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直到1980年代以后,战争加害方的日本和受害方的中国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对轰炸进行学术研究。研究首先从战时大后方的重庆大轰炸开展,日本学者前田哲男最早从世界战略轰炸思想演进的视角重点探讨了重庆大轰炸(1987年,前田哲男的研究成果《战略爆撃の思想:ゲルニカ—重慶—広島への軌跡》开始在朝日新闻社社刊《朝日杂志》(周刊)上连载,1988年朝日新闻社结集出版。)。中国学者黄淑君等则在发掘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市档案馆编:《重庆大轰炸》,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从1992年至今,重庆大轰炸研究一直备受关注,研究成果也最为显著。在资料发掘方面,有《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之《战略大轰炸》《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证人证言》等(代表性资料整理有:唐润明主编:《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2015年版;徐勇、臧运祜主编:《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之《战略大轰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周勇主编:《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证人证言》,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在研究领域方面,由早期重点关注重庆遭受的暴行与损害,到多维关注日本轰炸重庆的战略与实施、美英的反响及应对,轰炸的社会影响及历史遗留问题等。在研究视野方面,突破地方史和战争暴行史的视角,在纵向上将重庆大轰炸置于人类战略轰炸演进历程中进行考察,在横向上把重庆大轰炸置于抗战时期日军侵华战争和对大后方战略轰炸的总体背景中进行分析,更加注重战争责任、受害诉讼等现实关怀(刘世龙、一濑敬一郎、唐润明、徐勇主编:《重庆大轰炸(含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受害史事鉴定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在研究论著方面,发表学术论文超过100篇,出版专著《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重慶大爆撃の研究》《未曾谋面的屠杀:重庆大轰炸研究》等10余部(代表性成果有:潘洵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潘洵:《重慶大爆撃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16年版;唐润明:《未曾谋面的屠杀:重庆大轰炸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年版。)。研究的视角也在不断拓展,有总结战争教训的视角,有战略轰炸视角的研究,有战争记忆史学的视角,也有从战争责任和受害诉讼角度的考察。

除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外,学界对大后方其他重要城市和战略区域轰炸的研究也有所关注,如对大后方重点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轰炸均有相关研究成果,如《川渝大轰炸——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等(谢世廉:《川渝大轰炸——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肖银章等:《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大后方各省重点城市轰炸的研究也取得一些进展,既有对省会城市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西安、兰州、西宁等轰炸的研究(成都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和成都市国防教育学会:《成都大轰炸》,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年版;孙官生:《昆明大轰炸祭》,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也有对大后方中小城市如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大后方最大盐业基地自贡以及四川的乐山、云南的保山、甘肃的平凉等轰炸的关注,还有对滇缅公路等重要国际交通线轰炸的研究等。在已有研究中,对抗战大后方轰炸的综合性研究甚少(吴光会、潘洵:《抗战大后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的时空分布考察》,《西南大学学

报》2019年第1期,第183~192页)。

欧美学界,仅有拉纳·米特等极少数学者涉及重庆大轰炸的研究[拉纳·米特(Rana.Mitter)著,蒋永强等译:《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没有专门针对抗战大后方轰炸的专题研究。

## 二 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的主要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降,日军暴行和战争损失视野下的大后方轰炸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成果丰硕。近年来,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及档案文献的深入发掘,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轰炸记忆、国际比较、新域拓展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记忆史视角的轰炸书写。战争记忆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是交战国双方的全体社会成员基于不同的“战争体验”而形成的记忆,是由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等多层面记忆组成的集合体。近年来,伴随着“历史记忆”学术研究的引入,国内外学者也开始关注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的“轰炸记忆”。成果如贺建平以纪录片《重庆大轰炸》为例探讨创伤叙事与集体记忆的建构(贺建平、洪晓彬:《创伤叙事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以纪录片〈重庆大轰炸〉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5期,第88~90页),黄正光讨论了造成各方有关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历史记忆不同建构的原因,及历史记忆和无差别轰炸罪行之间的关系(黄正光:《无差别轰炸:民众的历史记忆与罪证之间(1937—1946)》,《民国档案》2019年第4期,第84~95页)。日本学者伊香俊哉专门研究了从战略轰炸到原子弹以及战斗详报的轰炸记录,揭示了扩大的“军事目标主义的虚妄”(伊香俊哉著,韩毅飞译:《战争的记忆——日中两国的共鸣和争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潘洵等深入探讨了战时、战后、新时期受害方、加害方、关联方关于“重庆大轰炸”历史记忆的演变和发展,并分析了各方历史记忆差异的原因所在(潘洵、高佳:《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建构——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135~146页)。在历史记忆的视域和语境下,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的内涵及意义不断被发现与挖掘,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国际视域下的多维研究。侵华日军对大后方的无差别轰炸行为,是涉及加害方、受害方和关联方的国际性问题,需“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背景中进行分析”(潘洵:《视野·理念·史料:关于深化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思考》,《西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67页)。潘洵关注了无差别轰炸的国际影响,认为对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不仅制造了对中国城市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也开启了二战中大规模持续战略轰炸的“恶例”(潘洵:《时空视野下重庆大轰炸历史地位的思考》,《抗战史料研究》2015年第2辑)。张瑾、闫立光等利用传媒学的研究方法,从《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对无差别轰炸的报道来观察二战期间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形象及大后方的风貌(张瑾、陈微:《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时代〉周刊为例》,《重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张瑾、高瑜:《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例》,《重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张瑾、王爽:《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纽约时报〉为例》,《重庆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闫立光、郭永虎:《抗战期间〈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探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荷兰学者张克雷(Vincent K.L.Chang)等将大后方军民面对无差别轰炸的“愈炸愈勇”视作抗战胜利的重要精神动力(Vincent K.L.Chang, ed. “Redefining Wartime Chongqi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of a global power in themaking 1938—46”, *Modern Asian Studies* 51, 3 (2017) pp. 577~621, 2017.)。此外,拉纳·米特(Rana.Mitter)、谭刚、唐润明、高佳、吴光会等学者的相关研究立足于国际视角,广泛地利用了英美和日本的史料,关注了无差别轰炸的国际影响等重要问题。

多元视野下的新域拓展。近年来,随着无差别轰炸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相关史料不断被整理挖掘,对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不断深入,所涉地域及范围进一步得到拓展。在研究地域上,除重庆大轰炸外,学者们对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甘肃等地重点城市的轰炸情况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在研究范围上,学界已对日军轰炸大后方的文化教育机构、工矿企业、医疗卫生设施、外国驻华机构等开展了专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

### 三 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的检讨及未来走向

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档案文献发掘整理不充分,研究理论、范式、方法相对单一,重点领域和问题探讨还不平衡、不深入等问题,关于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截至目前,既无专门的专题史料集,也无专门综合性的研究专著,还有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广阔空间。

第一,史料发掘与解读运用的进一步深化。已有关于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资料,在内容和类别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相当一批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没有得到发掘和利用。从史料内容上看,暴行方面的资料相对丰富,决策及影响方面的资料相对较少;一些重点区域或城市的资料较多,而其他地区的资料发掘整理则明显不足。从资料类别上看,军事方面的资料较多,而社会方面的资料并不丰富,加害方日本和受害方中国的资料较为丰富,而美英等关联第三方的资料则整理利用不多。资料的发掘整理无疑是深化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亟待发掘和整理大后方各省市和区县的档案馆有关轰炸的档案资料;亟待发掘利用日本防卫厅的有关战史资料,特别是其陆军、海军航空作战史资料;亟待发掘中国台湾地区的战时航空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内政部档案中的相关资料;亟待搜集美、英、苏等国家有关抗战大后方轰炸的档案文献资料,并注重资料的解读运用。

第二,研究理论和解释框架的进一步优化。目前的抗战大后方研究,仍然缺乏研究理论和解释框架方面的突破,缺乏话语体系的建构,尤其是侵华日军对大后方的轰炸,涉及到战略轰炸、政略轰炸、无差别轰炸、航空进攻作战、要地攻击等学术概念。如何建构抗战大后方轰炸的学术话语?已有研究较多局限于战争或暴行的视角,较少能立足于国际视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从加害方、受害方、关联方多方视角来开展研究并进行解释。同时,已有研究较多专注于具体地域、具体事件,缺乏整体的探讨,缺乏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对比思考来构建轰炸的解释体系。当然,“历史记忆”等解释框架的引入,有助于加深该研究的内涵。比如,梳理轰炸记忆的产生、形成与流传,揭露其多重表达,有助于深入系统地研究日军轰炸带给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重大变化和影响。

第三,研究范式及多学科方法的进一步转化。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涉及历史学、外交学、军事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因此,对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的研究更需要借鉴跨学科的理论及方法:通过历史学的方法开展实证研究,重建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的历史真相;通过军事学的方法考察日军航空兵器、轰炸战术的演进及其对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的实施,同时对后方民众的反空袭斗争进行整体研究;通过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探究轰炸对后方市民生活、社会心理、城市变迁产生的影响,等等。总之,多学科方法的融会贯通,能够为实证研究提供诸多新的视角,进而拓宽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第四,研究领域和专题内容的进一步强化。目前的抗战大后方轰炸研究在时间及空间上的失衡现象较严重,已有的成果从空间分布上来说,大都集中在对重庆、兰州、成都等省会城市的关注上,尤其是重庆,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二的比重,而其他后方各省和城市的研究则十分薄弱;从时间分布上来说,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相持阶段后的时间段上,较少有前后延展,或者打通进行研究;从研究对象上看,关注轰炸过程和损害研究较多,而对于侵华日军轰炸及中日之间轰炸与反轰炸的博弈的决策过程、轰炸对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等的研究则十分薄弱;关注对战时首都重庆轰炸的研究多,而关于侵华日军实施的西南、西北国际交通线轰炸的研究,实施的“盐遮断”、“中国要人住地”专项轰炸,甚至不顾国际公法,在云南等地实施毒气轰炸等的研究则关注不够。同时,已有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着手,缺乏“向下看,往细做”的眼光和意识,应当更多关注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对普通民众、对基层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而深化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性质及罪行的认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项目“中国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19KZD005)

收稿日期 2021-01-08

作者潘洵,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重庆,400715。